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王春元[1,2]
(1.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2. 浙江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合理安排财政支出的结构,从而保证其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文章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并以改进的经济模型,通过对我国 1978-2006 年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其在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失衡,进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给出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方案。

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经济增长;稳态增长率;效用最大化
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9)06-0120-11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关于政府支出的研究真正进入财政学领域是比较晚近的。1954 年,萨缪尔森发表了经典论文《一个关于政府支出的纯理论》后,才使得政府支出的研究融入财政学领域。而在此之前,大多数公共经济学家都将其注意力集中在税收理论及其实践的研究上。有学者认为消费者的效用不仅来自于私人消费,同样也来自于公共资本存量(Arrow Kurz,1970)。在关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规范分析把政府支出区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种,认为生产性支出的增加有利经济增长(Landau,1983;Aschauer,1989;Barro,1990)。在最优状态下,即生产性支出的增加促进稳态经济增长率的增加,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贡献度(产出弹性)之比(Devarajan、Swaroop 和 Zou,1996)。Devarajan、Swaroop 和 Zou(1996)通过对 43 个发展中国家 20 年的统计数据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后,发现传统的生产性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非生产性支出却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且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支出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在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方面,Barro(1991)利用

收稿日期:2009-03-17
作者简介:王春元(1980-),男,湖北团风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浙江教育学院教师。

98 个国家 1960—1985 年的数据,发现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其理由是政府消费对经济造成了扭曲,但同时没有能够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提供抵消性的激励。Gupta(2005)通过对 39 个低收入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的国家具有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而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资本品和非工资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较高。

国外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而且成果也颇丰。但是可以发现,国外对公共支出的分类,即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还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观点。另外,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在各国所表现出的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尽一致,有的是正相关,有的却是负相关。

在国内,最初对公共支出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视角来研究其规模。郭庆旺(1991)、赵志耘(1994)构建了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但是并没有进行经验分析。刘溶沧和马拴友(2001)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含私人投资、公共投资、国防支出、经常性支出、国债、劳动增长率与教育或人力资本在内的模型,但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其分析的重点。付文林(2006)在对中国公共支出相关变量的长期增长效应进行分析时发现,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共支出的 GDP 占比呈反向变动关系,显示中国公共支出政策的适应性特征;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增加会提高 GDP 增长率,而文教费和维持性支出比重与 GDP 增长率之间有着负的双向因果关系,这体现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特征。研究结果还显示,地方政府支出比重提高,经济增长率会上升,这说明通过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可以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从而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王小利(2005)认为,政府的非税收入和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的长期效应,而公共投资对其却没有很明显的作用。李红继、廖筠(2008)揭示出各项公共支出比重的变化导致公共支出产出弹性的变化,从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也发生变化。

以国内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看,从最初的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来研究其规模,到近来逐渐转入用实证的方法来分析和考察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而做出优化方面的决策。公共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得出的结论却有所差异。不过,国内在此问题的研究上,也存在与国外相似的问题,比如说哪些是生产性支出,哪些是非生产性支出,如何定义这两类支出,且这两类支出对经济增长所表现出来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另外,很多研究主要是进行实证检验,至于这种实证检验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却没有论及,因而所作出的判断也带有经验性,可信度也就值得商榷了。

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一定的理论框架,并进行实证检验,进而作出判断。

二、理论分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都极为关注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Arrow和Kurz(1970)所建立的模型假定消费者的效用不仅来自于私人消费,而且还来自于公共资本存量。他们认为所有的政府投资都具有生产性。但是这种建立新古典理论基础之上的模型认为,政府的支出只会影响到暂时性的经济增长率,而不会对稳态经济增长率产生任何影响。Barro(1990)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研究了公共支出与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在他的模型中,政府支出是私人支出的补充,并且所有支出都具有生产性特征。事实上,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政府支出区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他们的一个很重要发现就是,产出增长与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呈反比关系。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政府支出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并将其与资本一起作为生产要素,来研究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借鉴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的分析框架,但在本文中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将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并将其作为投入要素,来研究我国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假定生产函数由三部分组成:私人资本存量k,两种类型的政府支出g_1和g_2。其中:g_1为生产性支出,g_2为非生产性支出,则产出y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

$$y=f(k,g_1,g_2)=k^{\alpha}g_1^{\beta}g_2^{\gamma} \tag{1}$$

其中:$\alpha>0,\beta>0,\gamma>0,\alpha+\beta+\gamma=1$,$\alpha$、$\beta$、$\gamma$分别为私人资本存量k、生产性支出$g_1$、非生产性支出$g_2$的产出弹性,表明相应的投入要素增加一单位所带来的产出改变量,且假定规模报酬不变。

根据Barro(1990)的假定,政府的财政资金全部来源于固定税率的所得税收入τ①则有:

$$\tau y=g_1+g_2 \tag{2}$$

全部政府支出用于g_1的份额为$\phi(0\leqslant\phi\leqslant1)$,则有:

$$g_1=\phi\tau y \text{ 和 } g_2=(1-\phi)\tau y \tag{3}$$

假定τ和ϕ是给定的。

消费者选择消费c、资本k来最大化其福利水平:

$$U=\int_0^{\infty}u(c)e^{-\rho t}dt \tag{4}$$

其中:$\bar{k}=(1-\tau)y-c$,ρ是时间偏好率 (5)

$$u(c)=\frac{c^{1-\sigma}-1}{1-\sigma} \tag{6}$$

将(6)式代入(4)式且在约束条件(1)式、(2)式、(3)式和(5)式的情况下将其最大化，求出消费增长率有：

$$\frac{\dot{c}}{c}=\frac{-\alpha(1-\tau)k^{\alpha-1}g^{\beta+\gamma}\phi^{\beta}(1-\phi)^{\gamma}-\rho}{\sigma}$$
$$=\frac{-\alpha(1-\tau)(g/k)^{1-\alpha}\phi^{\beta}(1-\phi)^{\gamma}-\rho}{\sigma} \quad (7)$$

设消费的稳态增长率为 λ，并且假定在稳态增长路径上，税率 τ(进而g/y)固定不变。对(1)式、(2)式和(3)式做简单变形后可得出：

$$g/k=\tau^{-1/\alpha}\phi^{\beta/\alpha}(1-\phi)^{\gamma/\alpha} \quad (8)$$

将(8)式代入(7)式得到消费的稳态增长率为：

$$\lambda=\frac{-\alpha(1-\tau)\tau^{1-1/\alpha}\phi^{\beta/\alpha}(1-\phi)^{\gamma/\alpha}-\rho}{\sigma} \quad (9)$$

从(9)式中可以得到稳态增长率 λ 与 g_1 占政府支出份额 ϕ 之间的关系：

$$\frac{d\lambda}{d\phi}=\frac{(1-\tau)\tau^{1-1/\alpha}[\gamma\phi^{\beta/\alpha}(1-\phi)^{\gamma/\alpha-1}-\beta\phi^{\beta/\alpha-1}(1-\phi)^{\gamma/\alpha}]}{\sigma} \quad (10)$$

从(10)式中可以看出，如果 g_1 是生产性支出(其支出的增加能导致经济增长)，则 $d\lambda/d\phi>0$。

假定 λ 为正，等式(10)右边如果为正，则必须满足：

$$\gamma\phi^{\beta/\alpha}(1-\phi)^{\gamma/\alpha-1}-\beta\phi^{\beta/\alpha-1}(1-\phi)^{\gamma/\alpha}>0 \quad (11)$$

则必有：

$$\frac{\phi}{1-\phi}<\frac{\beta}{\gamma} \quad (12)$$

等式(12)意味着，增长率的变化不仅取决于两类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 β 和 γ，还取决于其在总支出中所占的份额 ϕ。如果两类支出的份额之比 $\frac{\phi}{1-\phi}$ 小于其生产率之比 $\frac{\beta}{\gamma}$，则增加生产性支出 g_1，则会增加经济的长期增长率。

注意到经济增长率的增加可以通过增加对生产性支出的投入来达到，而又不必改变总的支出量。为了对此进行检验，可以考察 λ 和 τ 之间的关系(因为政府支出全部来自于税收)。经过简单变换有：

$$\frac{d\lambda}{d\tau}>(<)0 \text{ 当 } \tau<(>)\beta+\gamma$$

很明显，λ 和 τ 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 τ、β 和 γ 三者之间的关系：当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之和 β+γ 超过税率 τ 时，增加政府总支出能够提高经济的稳态增长率；反之则反是。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在理论分析框架中，我们检验了不同种类支出的份额

是否与高的经济增长率有关。因此,模型中的关键解释变量是每一种支出占总支出的份额。为了控制水平效应,模型中引入财政支出占 GDP 的份额这一变量。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人均真实 GDP 的增长率。选择 1978—2006 年的数据作为样本。[②] 变量如下:

(1)$GRPCGDP_t$:t 期人均真实 GDP 的增长率。

(2)$(TE/GDP)_t$:t 期财政总支出占 GDP 的比重。

(3)$(G_k/TE)_t$:t 期财政支出的比重向量。按功能性分类的支出份额为:Def/Te=国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Hlth/Te=医疗卫生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Ed/Te=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Ec/Te=经济建设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Am/Te=行政管理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分别对各变量取对数,采用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模型便得如下方程:

$$\ln GRPCGDP_t = \alpha + \beta_1 \ln(TE/GDP)_t + \sum_k \beta_k \ln(G_k/TE)_t + \mu_t$$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各参数除 lnAm/Te、ln Def/Te、ln Ed/Te 外,其余都在 5%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但可决系数 R^2 都比较小,表明在样本范围内用回归模型来预测被解释变量不是很好,回归拟合效果不佳;同时 D-W 值偏小,表明残差序列存在正的自相关,因此,必须通过一定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表 1 回归分析——被解释变量:$GRPCGDP_t$ 样本(经调整后):1980—2006 年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α	−23.098930	8.613539	−2.681700	0.0152
ln $GRPCGDP_{t-1}$	0.454827	0.257235	1.768137	0.0940
ln $GRPCGDP_{t-2}$	−0.805593	0.215512	−3.738052	0.0015
ln TE/GDP	−4.406980	2.192181	−2.010318	0.0596
ln Am/Te	−2.285546	1.118539	−2.043332	0.0559
ln Def/Te	−1.293806	0.793626	−1.630246	0.1204
ln Ec/Te	−3.812055	1.218171	−3.129327	0.0058
ln Ed/Te	2.599363	1.466911	1.771998	0.0933
ln Hlth/Te	−4.307742	1.960875	−2.196847	0.0414
R-squared	0.740015	Mean dependent var		−2.169691
Adjusted R-squared	0.624466	S. D. dependent var		0.433300
S. E. of regression	0.265530	Akaike info criterion		0.447021
Sum squared resid	1.269108	Schwarz criterion		0.878966
Log likelihood	2.965219	F−statistic		6.404353
Durbin-Watson stat	2.002014	Prob(F−statistic)		0.000538

为了解决残差项之间的序列正相关问题,引入 AR(2)技术。[③] 调整后模型的 R^2 显著提高,拟合度提高了;同时 D-W 值也达到 2,残差项的序列自相关问题也得以解决。并且,绝大部分参数在 5%的置信水平下均通过检验,检验效果较前一模型大有提高(如表 1 所示),因此最终的回归方程为:

$$\ln GRPCGDP_t = \alpha + \beta_1 \ln(TE/GDP)_t + \beta_2 \ln GRPCGDP_{t-1} + \beta_3 \ln GRPCGDP_{t-2} + \sum_k \beta_k \ln(G_k/TE)_t + \mu_t$$

（二）回归数据分析。

1. 由表1可见，政府财政总支出对人均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统计上也很显著。表明自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没有体现其应有的正效应，反而对其有一定阻碍。这与前文模型中的分析一致：为了维持高水平的政府支出，需要征收更多的扭曲性税收，同时，稳态增长率要提高，必须是政府支出的生产率之和超过由于征收扭曲性税收而导致的“无谓损失”。由此可以认为，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生产率之和低于这一“无谓损失”，即税收负担偏重。由表2可见，我国的税收负担在1978—2007年的近30年时间里，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4年，税收负担基本维持在15%以下，而且基本呈下降趋势；1984年到1985年，税收负担有一个比较大的跳跃，由13.21%上升到22.77%；1985—1996年，税收负担由22.77%下降到9.71%；1997—2007年，税收负担由10.43%上升到18.28%，尤其是从2005年开始，税收负担增长比较快。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那么今后几年，我国的税收负担将会越来越重！

一般认为，一国的税收负担在15%左右是比较合理，显然我国目前的税负已经超过了这一值，势必对经济造成一定的扭曲，影响经济的增长。

表2　1978—2007年我国税收负担表　　单位：%

年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税收负担	14.33	13.32	12.65	12.95	13.22	13.07	13.21	22.77	20.49	17.89
年份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税收负担	15.89	16.05	15.12	13.73	12.25	12.04	10.64	9.93	9.71	10.43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税收负担	10.97	11.91	12.68	13.95	14.66	14.74	15.12	15.71	16.42	18.28

资料来源：根据1978—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以及《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整理得到。

2. 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统计上也比较显著。[④]经济增长基本上能保持和教育支出的同步增长，即教育支出增加1%，能使经济增长2.6%。因此，政府增加教育方面的投入能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由图1可见，自1978年以来，我国教育支出在GDP中的比重基本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上，但相对而言，还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在1978—2006年的近30年中教育支出的GDP占比一直处在3%以下，有的年份甚至低于2%(1995年为1.97%，1996年为1.99%，1997年为1.96%)，这不仅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6%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从回归分析结果看，我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很大的拉动作用，而且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目前我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还显不足。长远来看，有

必要增加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因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提高人口质量的关键是教育投资,而且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投资的收益率。据美国经济研究局估计,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经济增长率年均3.5%,其中约1.7%得自增加资本和劳动力,1.8%来自技术革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亦即技术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总增长的一半。[⑤]日本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把"贸易立国"战略、"引进吸收型"科技政策更新为"科技立国"战略,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并在内阁机构中专设"教育改革实施总部",大力推进教育改革。这些措施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

从另一方面看,教育经费支出增长率应高于GDP增长率,即教育经费超前增长。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而教育投入的回报周期一般又比较长,不超前投入,就不能收到较好的效益。[⑥]而我国目前大致也就是这种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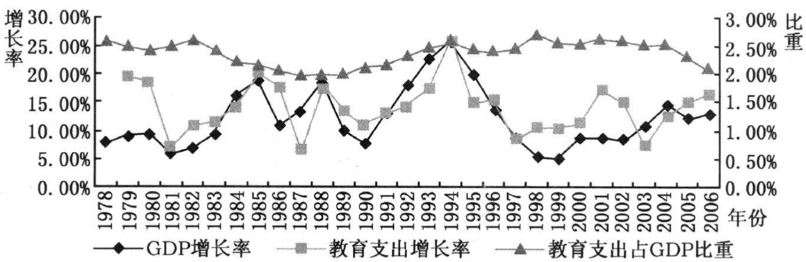

图1 1978—2006年我国教育支出增长率、GDP增长率和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变化趋势

3.经济建设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且统计上显著,表明我国经济建设性投入不仅没有导致经济的快速增长,反而对其有一定阻碍作用。

如图2所示,自1978年以来,经济建设性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由1978年的19.7%下降到2006年的5.07%,降低了近300%。经济建设性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也同样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64.08%下降到2006年的26.56%,下降速度也极为迅速。从这两个指标值看,我国的经济建设性支出在逐年减少,而且总量上也偏少。从经济建设性支出的内部结构看,基本设施支出比重的波动幅度比较大,总体上也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

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应与经济产出同等增长:基础设施存量增长1%,GDP就会相应增加1%,各国都是如此。依据此经验值及结合回归分析结果,我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有可能是不足的,也就是意味着,虽然我国在整个经济建设方面的投入比较大,但在结构上存在失衡,即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略显不足。大量的经济建设支出被用于基础设施以外的领域。事实上,经济建设性支出的总量逐年减少,使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没有很好地显现出来,在降低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有可能表

现出阻碍作用,两者间就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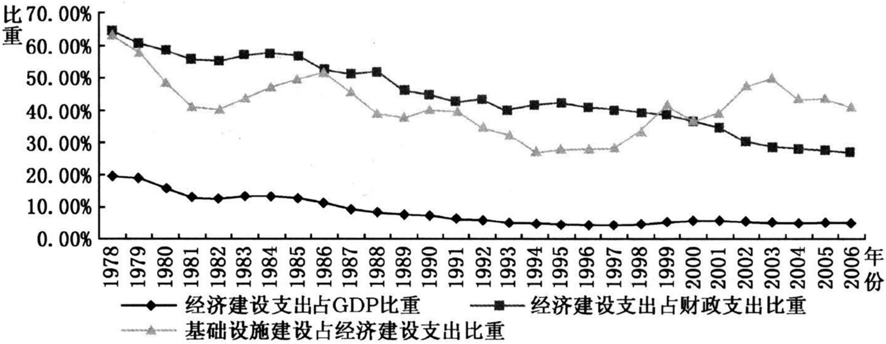

图 2　1978—2006 年经济建设各项指标变化趋势

4. 国防和行政管理支出对经济增长均具有较大的负效应,且统计上很显著。这两部分支出挤占了其他支出,使得其他支出在总支出中的份额减小。国防和行政管理这两项支出属消费性支出。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时,增加政府消费性支出能扩大社会总需求,提高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特别是提高现有资本存量的利用,进而提高利润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是这种消费性支出的增加会挤占生产性支出应有的份额,导致社会总投资减少,而投资则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当前我国财政支出中相当部分被用于应付行政管理支出的不断膨胀,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4.7%增加到 2006 年的 18.7%,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增加 14 个百分点;其占 GDP 的比重从 1998 年开始上升,由 1998 年的 1.9%上升到 2006 年的 3.6%,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增加了 1.7 个百分点。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已显得过大,而且急剧膨胀,这势必挤占其他项目的支出,而行政管理支出作为一种消耗性支出,不会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并且具有支出刚性,[⑦] 从而削弱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回归分析中也可以看出,行政管理支出增长 1%,就会使经济增长下降近 2.3 个百分点,即这部分支出对经济发展的负作用显得较为明显。

相比较而言,国防支出占 GDP 比重自 1979 年开始逐年下降,由 1979 年的 5.48%下降到 2006 年的 1.41%(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同样呈逐年下降趋势,由 1979 年的 17.37%下降至 2006 年的 7.37%)。同样是消费性支出的国防支出,它所起的作用与行政支出完全不同。这部分支出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我国国防力量的强大与否,进而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能否得到切实保障。因此,我们不能依据回归分析的结果来判定,国防支出应减少,相反,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的国防支出应该适度增长,见图 3 所示。

5. 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统计上不很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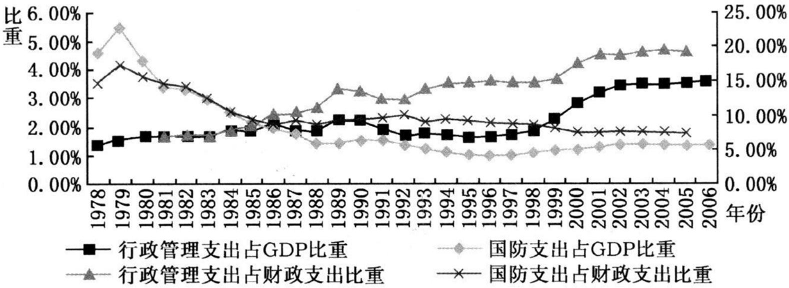

图3 1978—2006年行政管理支出和国防支出占GDP的比值变化趋势

因此,我们不能将其作为降低医疗卫生支出的依据。医疗卫生支出属于社会服务性支出,如果维持适当的水平,能对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对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具有相当大的作用,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同样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如果说教育能保障人民精神上的健康和智力水平,那么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就能有力地保障人民生理上的健康。而我国目前的此项支出仍处在较低的水平上。自1978年以来,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处在4%左右。但是该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从1998年开始呈下降趋势,即其占比由1998年的34.07%下降至2006年的24.35%,下降近10个百分点。因而,可以判断医疗卫生支出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减弱,甚至如回归分析中所显示的负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总结与政策建议

1. 生产性支出。在我国现行财政支出的各个项目中,仅仅只有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其他项目均表现出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教育支出属于生产性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虽然表现出负相关性,但是,从其功能作用看,还是可以将其作为一项生产性支出。在财政支出结构中,应加大这两方面的投入。因为前者关系到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是经济发展的长久动力;而后者则关系国民的身心健康,关系到国民能否全身心投入工作,虽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很明显,但却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后发优势。如果在这两方面的支出不足,即使经济在短期内得到发展,但从长远看,还是会暴露出弊端,呈现愈来愈显著的增长后劲不足。

科研支出也是一项生产性支出,应该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这样更有助于使科学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当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主要取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因此,加大对科研方面的投入十分重要,并且它和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经济建设性支出从本质上讲,应该是一项生产性支出,但是,在我国却没有体现出其生产性的一面。因此,要使经济建设性支出更好地发挥其生产性作用,就必须加大投入;同时,也要合理安排其内部结构,尤其是用于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可以适当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改变投资环境,而且能拉动内需,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而将其他领域让位于市场,让私人经济充分竞争,政府主要进行宏观调控。

2. 非生产性支出。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表现出较强的负相关性,是一项非生产性支出,应该进行削减。根据瓦格纳法则,公共支出往往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呈现出扩张的趋势。因此,行政管理支出的增加,既有其不可避免的一面,又有其不合理的一面。首先,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政府虽然努力向“小政府”方向转变,但毕竟要管理的事务还很多,而且短期内完全放任市场运作还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因此行政管理支出的增加无法避免。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各级政府有着膨胀的趋势,触及很多领域(本来有些领域已经交给市场),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政府的影子。人员经费也在增加,其中很多都是些不必要的开支,例如公务车开支、公费旅游等。由此可见,行政管理支出完全可以降低。因此,财政支出的安排应该考虑到我国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在现阶段,行政管理支出应减少。

当然,部分支出项目是有其特殊的用途,其自身特有的用途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更为重要。比如国防支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开支,而且其支出往往也会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在冷战时期,我国的国防支出一直处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而随着 1991 年苏东剧变,我国在这方面的支出也相应减少,并且一直保持在比较平稳的水平上。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的国防支出还是应该适度增加。

注释:

①一般来说,政府的财政资金不仅仅来自于税收,还包括一些收费,以及发行国债。当然,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模型会发生变化,也会更为复杂。

②文中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以及经整理后得到。

③引入 AR(1)技术后,残差项仍然存在序列正自相关。

④笔者将科研支出作为一解释变量引入模型发现,科研支出与经济增长也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但是,加入该变量后,模型中有部分变量无法通过检验。因而,本模型中没有考虑科研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⑤参见顾明远,薛理银:《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0 页。

⑥参见丛树海:《财政支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47 页。

⑦行政支出在随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保持合理增长趋势的前提下,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不应呈现出大起大落式的剧烈波动。

参考文献：
[1]赵佳佳，王建林．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探讨——基于中国样本[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7，(12)：21－26.
[2]曹艳春．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06，(4)：65－68.
[3]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103－125.
[4]Barro R J.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106：407－444.
[5]Arrow K J，M Kurz. Public investment ，the rate of return and optimal fiscal policy [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Baltimore，MD，1970.
[6]Aschauer D. Is government spending productiv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9，23：177－200.
[7]Aschauer D，J Greenwood.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J]. G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1985，23：91－138.
[8]Shantayanan Devarajan，Vingya Swaroop，Heng-fu Zou.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6，37：313－344.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ANG Chun-yuan[1,2]

(1.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Zhejiang Education Institute*,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are favorable for the reasonable arrangement of fiscal expenditure, thus leading to greater positive effects of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on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paper makes empirical studies by using the data from 1978 to 2006. It finds that there exists a disequilibrium in China's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and then provides suggestions about optimizing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in China.

Key words: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economic growth; steady-state growth rate; maximization of utility

(责任编辑　许　柏)